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

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
『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胡祥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

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 『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胡祥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方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经费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 胡祥琴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203-3240-8

I. ①怪… II. ①胡… III. ①中国历史-史籍研究-南北朝时代
IV. ①K239.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3080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19千字
定 价 7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有益与无益杂糅的东西。对于前者，我们固然应采取批判继承并加以发展的态度；而对于后者，则应谨慎地对待，既不能把无益当作精华，也不能视精华为无益，而应当分清什么是有益、什么是无益，进而抉择去取，并说明抉择去取之由。例如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一类的著作，正属于后一种情况，是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难中之难。

胡祥琴副教授所撰博士学位论文《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正是选择了这个“难中之难”，于此可见作者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诚如作者所说，由于研究上的困难和近代以来“科学昌明，理性发达”，人们往往不把这一领域视为重点加以研究，以致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不被研究者所关注。

记得2008年，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时，我本人负责编撰第一卷《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时，发现“二十四史”中关于书志部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是有关“艺文志”、“经籍志”、“河渠志（书）”、“地理志”有些论文刊发出来。研究《五行志》的论文寥寥可数。至于我自己对于《五行志》、《符瑞志》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和肤浅的，认为它们的价值只是在于保存了一些有关自然现象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我曾向一位青年朋友建议，试将《汉书·五行志》中所记自然现象加以梳理，进而写篇文章。后来，这个年轻人果然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片面认识，着实汗颜。

胡祥琴博士选择南北朝三部“正史”中的“五行”“符瑞”诸志作为研究对象，表明作者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这里所说三部“正史”即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其中当有这样一些考量：第一，既关注到考察朝代更迭过程中的有关历史现象，也注意到仅就

一个朝代兴衰过程中的相关考察；第二，一方面研究以汉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的皇朝，另一方面又探讨以北方少数民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的皇朝；第三，充分考虑到南、北对立与之联系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所作的研究，自应具有较高程度的代表性和近于历史的真实性。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指出：“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关于该时代的‘自然灾害’问题，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二是这些荒诞的记述方式，实际上是现实政治的曲折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也有重要意义。”这一认识，是对上述研究对象作深入的和全面的考察才能概括出来的。从“正史”的《五行志》、《符瑞志》的研究来说，作者的思考和立论，都显示出学术上的开拓精神。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面对一个艰难的研究领域，选择正确的和合适的研究方法，是促使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603页）。本书作者的研究方法正是遵循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清晰地表现为这样的路径：首先，从五行观的产生及其演变到《汉书·五行志》的出现，这是“五行”学说从哲学形态走向史学形态的过程；其次，“五行”学说从史学形态又翻转过来影响（尽管是折射的影响）到政治形态，而《汉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等，正是在其不同的“发展点上”表现出来的“典范形式”。而这正是作者的着力处，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作者在探讨南北朝三部“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的范围上，使宏观论述与微观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可以看作是理论思考与个案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避免了泛泛而论，也不致陷于无根之谈。如作者着眼宏观，于第一章讨论“五行思想的渊源与流变”，而于第二、第三两章分别阐述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产生及其位置与特点，相对于前者来说，这是进入微观的讨论，即对“诗妖”“服妖”作了更细致的探析。作者进而在第四章中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作“个案研

究”，相对于第二、第三章来说，这是更深入的微观探索。这种宏观与微观两相照应，一般与个别相得益彰，层次分明，步步深入，使人读来明白、易晓，不觉晦涩。这是本书在叙事与议论上的成功之处。

沿着理论与方法所指引的路径，通过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究，并着眼于“通”的考察，作者“超越”论题的范围从而赋予论题更深刻的底蕴，揭示出对于“五行”诸志在流变中的重要变化，即《旧唐书》以前，它们的“主题”是附会政治统治，为朝代盛衰兴亡“创造”出种种“天意”的神话，乃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自欧阳修撰《新唐书·五行志》起，“五行”多倾向于“略作《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这就是说，《五行志》已不再披着神秘的面纱为政治统治虔诚地念着咒语了。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当然也是中国史学上人们历史观的一大变化。除了作者指出的经学盛衰对《五行志》撰述方式产生影响外，人们在天人关系认识的发展上，已无法容忍与天人感应、谶纬邪说相关的思想在史书中处于显赫的位置。在“五行”“符瑞”诸志盛昌之时，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大步前进，这从王充到柳宗元的思想轨迹看得十分清楚。王充“不仅把‘天’从自然界驱逐出去，而且还把‘天’从历史的领域驱逐出去”；而柳宗元“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从自然观一直贯穿于历史观”，从而展开了“对神学历史观的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263、265页）。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者对于“五行”“符瑞”诸志在“正史”的位置及其变化的结论，是一个重要而有见地的结论。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反映历史现象的史书内容也是复杂的。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对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以下历代正史的《五行志》及其以前的“正史”中的《五行志》应区别看待，即使对极为“荒诞”的南北朝三部“正史”中的“五行”“符瑞”诸志也应作辩证看待，即对它们的社会（政治）属性应予以揭示，而对它们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内容，则不能因前者而予以否认。作者引用丰富的资料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自然史价值”作了细致的和深入的分类阐述，尤其是对它的几个特点的概括，颇有参考价值。这一部分内容，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尤为突出，也给人们许多启发。概括说来，作者在本书第五章中提出的问题及研究路径，进一步反映了对《五行志》的全局及其局部的认识，都贯穿着辩证法的精神。这正是作者在讨论“怪异的叙事”之时，不至于走向

偏颇而始终保持对于研究对象的理性态度之关键所在。

我对“正史”中的《五行志》没有研究，知之甚少。祥琴博士索序，勉强写了上面这些肤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

瞿林东

撰于2018年1月2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 题解	(1)
二 学术史回顾	(3)
三 研究思路	(14)
第一章 五行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17)
第一节 两种不同的五行观	(17)
一 《尚书·洪范》五行观	(17)
二 思孟学派的五行观	(21)
第二节 《尚书·洪范》五行观的流变	(23)
一 《春秋》及相关文献中的天人感应思想	(25)
二 邹衍的五行历史观	(34)
三 《月令》图式对五行模式化的影响	(38)
四 《洪范五行传》对五行思想的发挥及影响	(40)
第三节 《汉书·五行志》的产生及其影响	(46)
一 “以傅《春秋》”：《汉书·五行志》的产生	(46)
二 从《汉书·五行志》到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 诸志	(52)
第二章 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产生	(55)
第一节 “咎征”、“休征”与“五行”、“符瑞”	(55)
一 “咎、休”征的历史由来	(55)
二 咎、休征与“灾异说”、“祥瑞说”的关系及影响	(59)
三 咎征与《五行志》	(62)
四 休征与“符瑞”诸志	(67)
第二节 “五行”、“符瑞”诸志的成书	(71)

一 《宋书》“符瑞”、“五行”志的撰述	(71)
二 《南齐书》“祥瑞”、“五行”志的撰述	(74)
三 《魏书·灵征志》的撰述	(75)
第三节 “五行”、“符瑞”诸志的撰写意图	(77)
一 《五行志》：举远明近	(77)
二 “符瑞”诸志的撰述意图	(83)
第三章 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位置及特点	(91)
第一节 “五行”、“符瑞”等志在史书中的位置	(92)
一 在历代正史中的地位	(92)
二 在其他各志中的位置	(99)
第二节 “五行”、“符瑞”等志的特点	(105)
一 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	(105)
二 内容驳杂，主题突出	(111)
三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14)
四 思辨性特征明显	(118)
第四章 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个案研究	(123)
第一节 “诗妖”的性质	(124)
一 “诗妖”释义	(124)
二 “诗妖”的类别	(126)
三 “诗妖”折射的社会历史面貌	(131)
第二节 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中的“服妖”撰述	(137)
一 “服妖”释义	(137)
二 “服妖”的成因	(142)
三 《五行志》“服妖”举隅	(147)
第五章 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自然史价值	(159)
第一节 环境变迁与《五行志》的“灾异”撰述	(160)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点	(160)
二 “五行、五事”配灾异的基本情况	(165)
第二节 自然灾害的类型与特点	(172)
一 《五行志》所载自然灾害的类型	(172)
二 《五行志》所见自然灾害的特点	(182)

结 语	(186)
附 表	(189)
参考文献	(194)
后 记	(203)

绪 论

一 题解

“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自西周以降的两千余年来，五行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及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人的政治观念，干预着古人的政治生活。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两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① 最迟不晚于汉代，五行思想由哲学、政治领域渗入史学领域，对包括班固等史家的史书编纂活动发生深远影响。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 18 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参见附表 1）。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以来，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和体例就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并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在两种因素的左右下，关于古代正史中《五行志》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第一，作为古代多数正史中专题论著的重要构成部分，《五行志》与《尚书》、《春秋》等经学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尚书》文字佶屈聱牙，《春秋》蕴含“微言大义”，二者古来即为专门之学，却又是考察正史《五行志》者不得不涉及的内容。正史《五行志》的研究必须同时对古代经学、史学的内容加以涉猎，否则很容易流于表面，不得其实，因此自然被学者视为畏途。第二，正史《五行志》多涉怪异荒诞之类的记载，在近代科学昌明、理性发达的背景下，其科学价值为人们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4 页。

所鄙夷自不必说,即使古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史家,也曾视之为不经之论。比如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就曾断言:“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①清人龚自珍甚至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②白寿彝先生也认为:“《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是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班固新创的项目。”^③

不过随着近年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史、民俗史等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正史“五行”诸志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当中。立足于史学史基本方法,借助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开展古代正史“五行”诸志研究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据笔者所见,目前已有学者试图全面剖析《五行志》的编纂原则和写作志趣^④,便是最好的证明。本书之所以选择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宋书》等南北朝正史“五行”诸志所载内容,隐含着作者特定的撰史理念和编写意图,挖掘这一内容,有助于深化关于南北朝史学丰富内涵的认识。从《尚书·甘誓》第一次提出“五行”,到同书《洪范》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定义“五行”,表明古人通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终于总结出关于自然界物质构成的一般认识,而且在初期阶段,这种认识当中并没有神秘化的因素。^⑤而在不晚于《汉书·五行志》产生的时代,“五行”已发展演变为一个庞大有序的体系,原先朴素的五种要素已与方位、政事、灾异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张反映官方话语

① 刘知幾:《史通》卷3《书志》,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②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与陈博士笺》,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11页。

③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④ 游自勇以中国中古时期的《五行志》为研究对象,以研究《五行志》的编撰原则和记述方式之变化为核心,探究这种志书的演变过程及历史背景,并试图解读《五行志》怪异书写模式背后的历史信息。参见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绪论”,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⑤ 徐复观指出:“一直到春秋时代为止,所谓五行,只指的是国计民生所通用的五种材料,所以又称为‘五材’;丝毫没有作为构成宇宙的五种基本元素,或由阴阳二气分化而为五气的意味,并且与阴阳的观念,全不相干。”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权的意识形态之网。^①要说明这些问题,不仅要廓清五行与秦汉以前各种社会思潮的联系,而且需说明白正史《五行志》的撰写缘由与意图。

其次,正确解读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进一步把握南北朝社会性质的关键之一。史学著作的出现总是特定时代使然,这一历史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史学史研究。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出现,不仅与此前史学传统的继承有关^②,而且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紧密相关。在撰写思路和方法上,南北朝正史《五行志》基本遵循《汉书·五行志》的基本模式,但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时代特征,“符瑞”“灵征”诸志的出现正是这种特征的集中反映,也是统治者“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政治意图在史学著作中的体现。而截至目前,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只见到一些凤毛麟角的评论。通过“五行”“符瑞”诸志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更准确认识南北朝的社会性质。

最后,“五行”“符瑞”诸志是以神秘主义的撰述手段表达现实的政治目的,表面上看来是在言怪异,实际上则是在影射现实社会问题。如何透过现象捕捉到真实的历史信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怪异著述中发掘事物的本质,也是本选题的重要意义所在。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关于该时代的“自然灾害”问题,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二是这些荒诞的记述方式,实际上是现实政治的曲折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二 学术史回顾

由于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与《汉书·五行志》在思想来源、体例及功能等方面基本一致,加之以往学界关于该主题的专门研究

^① 齐思和曾说过:“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宗教、天文、舆地,细而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阵,莫不以五行说为之骨干。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五行说既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欲治中国学术,非先将五行说作一彻底之研究,直无从探其肯綮而获其症结。”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② 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记述的连续性。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成果较少，因此本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并不严格局限于此，不少内容会兼及整个古代正史《五行志》的研究现状。为书写方便，以下论述中将“五行”“符瑞”诸志统称《五行志》。

唐人刘知幾较早从史学方法的角度对《五行志》进行反思，指出《五行志》以灾异附会人事方面的牵强，并发现很多问题，撰写了《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认为“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①他又将这方面的错误归为四科，每科又细分为几种。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并没有否定《五行志》本身，也没有对灾异附会人事的做法提出根本性批判，只是从史学理论的方面对班氏《五行志》的具体问题进行反驳。显然，他对《五行志》的性质依然是肯定的，对灾祥也是深信不疑的。^②真正对《五行志》的性质及其撰述方法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宋人欧阳修，他认为在撰述《五行志》时应当“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③可见欧阳修从根本上对《五行志》以灾异附会人事的解释方法提出了批判。与此相应，宋人郑樵和清人章学诚也对此极力批驳，郑樵指出《五行志》是“欺天之学”，并在其《通志二十略》中决然削去事应，只记灾祥，称为《灾祥略》。^④清人章学诚也对古人以灾异附会人事的做法提出意见，他说：“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征应，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⑤清人龚自珍甚至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⑥以上诸家对于《五行志》的质疑及否定，说明作为时代产物的《五行志》，在不断面对批判的命运。

然而，古代学者从唐代的刘知幾到清代的赵翼、钱大昕等，对《五

① 刘知幾：《史通》卷19《五行志错误》，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3页。

② 正如刘知幾所感叹：“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刘知幾：《史通》卷3《书志》，浦起龙通释本，第63页。

③ 《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3页。

④ 郑樵指出：“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郑樵：《通志二十略·灾祥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05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6页。

⑥ 龚自珍：《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6页。

行志》的批判,概括起来,多集中于人事对灾异的附会之上,但并未否定五行与灾异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功能。^①据现存文献可知,古代学者并没有人从《五行志》的思想渊源、内部结构、撰述意图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展开讨论,因此这些零星的见解依然是分散的、不具规模的。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五行志》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归纳而言,从时间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倾向。80年代以前,学者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五行志》的性质进行界定,而对其具体内容很少做专门研究。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详细论及近代学者对魏晋玄学、佛教等层面的研究概貌,却未涉及该时期与《五行志》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等情况。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在整体继承前辈对《五行志》性质论断的基础上,有学者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得出关于《五行志》的更丰富认识。该时期发表的一批论著,尤其是近些年出现的硕博学位论文,开始对《五行志》的撰述意图、内部结构以及相关史料价值展开考察。^②

就笔者所了解目前学术界的一般情况而言,专门讨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论著还很欠缺,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其他主题的各种论著。考虑到这一情况,本书将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而不是时段的不同)进行归类评议,希望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

(一) 关于《五行志》性质与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五行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先秦时期成书的《尚书·洪范》,记载了古人将纷繁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存在,归纳为若干一般要素的“五行”观念。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五行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并提出“五德终始”说,五行学说自此成为替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有力工具。西汉时期,董仲舒、夏侯始昌等人将五行

^① 参阅桂罗敏《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2年。

^② 代表性论著有向燕南:《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游自勇:《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及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桂罗敏博士学位论文《灾异与秩序——〈汉书·五行志〉研究》等。

与儒家思想融合起来解释人类社会，于是政权交替、权臣更换等都成为该理论关注的重点。

20 世纪初期，梁启超撰述《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以科学的眼光审视阴阳五行说，认为其“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盘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① 这一论断深刻影响了学界对《五行志》性质的判断。实际上，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具有神秘性的特点，阴阳五行灾异是体现这一特点的重要载体，即便是“迷信”也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途径之一，这和近代以来基于科学观念基础上的所谓“迷信”不是同一个范畴。^②

从史学史的角度解释《五行志》性质的论著较少，部分学者只是简单予以提及。顾颉刚指出，《五行志》是关于古代自然变异的情况。^③ 李宗仁、金毓黻等一批早期史学史研究专家在各自的《中国史学史》中，略及《五行志》，但并未作出任何结论。杜维运在评价《宋书》时指出“《宋书》的八志，是精辟之作”，并总结性地说明其他各志的价值。在讲到《五行志》时，杜氏认为《符瑞志》、《五行志》中充斥荒诞之说，有“疣赘”之感。^④ 王树民指出，《宋书》除在《天文》、《五行》等志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等“谬说”外，又特立一篇《符瑞志》，内容远及传说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事，大量散布虚伪的历史和荒唐的迷信。^⑤ 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论集》中讲道，《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三志以 12 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讖、僧讖等神秘记录之大成，总的目的不过在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在沈约笔下，汉魏、魏晋、晋宋之际，一如五帝三王之受命，没有什么两样；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后以外藩入继大统，跟齐高帝的自立，在受命为帝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两样。^⑥ 瞿林东先生指出，《宋书》最突出的特点，

①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3、353 页。

② 参阅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绪论”，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 年。

③ 顾颉刚著，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7 页。

④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92 页。

⑤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77 页。

⑥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51 页。

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如《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记载。这反映了沈约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他还认为，《南齐书》之《天文志》、《祥瑞志》、《五行志》等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等，使该书在历史观上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① 仓修良指出，《宋书》存在的问题很突出。沈约在历史观上是个有神论者，他的《天文》、《符瑞》、《五行》等著作集中地宣扬了天命思想，试图证明汉魏以来的帝王无一例外都是“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再比如，沈约在《符瑞志》中还全文引录班彪《王命论》，来说明“神器之有授无贪”，“贫穷亦有命也”，“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② 等宿命论观点。

以上诸位学者的论断可以概括为：第一，《五行志》的志趣在于通过大量物异来宣扬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作者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史观；第二，《五行志》内容庞杂，涉及领域广泛。尽管早期史学家对《五行志》性质皆持批判态度，但该志的其他丰富价值也被察觉并论及，对于后学进一步研究《五行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白寿彝、瞿林东等先生关于《宋书》主旨与特色的论断，给予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

如果从现代科学的立场看的话，我们固然不难发现《五行志》所载诸多内容违背常理，荒诞不稽，难以理解。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却无不或扭曲、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某些真实面相。一方面，南北朝正史《五行志》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再现。汉代时期的五行学说就已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对于以后南北朝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发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五行志》运用自然物象的变化来解释当世或前代的政治事件，从本质上讲是将毫无瓜葛的两类事物加以人为的神学化解释。《五行志》中被赋予神学色彩的自然物象自然是荒诞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这些自然物象被剥掉神性外衣之后，人们却发现其中蕴含着某些客观真实的东西。因此，重新认识《五行志》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五行志》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其意图与价值、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和自然灾害史的讨论方面。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261页。

②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